

【钱学森与社会工程研究】 主持人: 林 坚 顾 问: 黄顺基

# 社会系统工程与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

[编者按] 2014年3月30日,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社会系统工程研究中心成立暨“社会系统工程与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学术研讨会在中国人民大学逸夫会堂第一会议室举行,来自十余所高校和学术团体的专家、学者和一些媒体的代表参加了会议。现将会议主要发言内容选载如下。

关键词: 智库; 顶层设计; 核心价值观; 钱学森; 综合集成法

中图分类号: N949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2-8572(2014)03-0001-18

## 社会系统工程方法是辩证法的创新

黄顺基

(中国人民大学荣誉一级教授)

首先祝贺研究中心的成立。研究中心实际上是提供智力产品的智库,所以衷心希望我们研究中心成为一个有特色、高质量的智库。

特色表现在哪里呢?我认为特色就是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指导下,运用现代科学技术,特别是运用社会系统工程的理论与方法,去分析、研究改革进程当中提出的事关全局的战略问题,这就是我们的特色,不同于外国智库的地方。它高质量的标准是什么?我觉得应该是在系统分析、系统设计、综合评价的基础上,向有关方面提供有思想、有价值、可以操作的政策建议,在全国的咨询、智囊机构里面具有竞争力、影响力,这就是高质量。有特色、高质量的智库怎么样组织?怎么样运作呢?我的想法是按照著名的科学家钱学森多次向中央领导建议的“总体设计部”这个设想来组织和运作。钱老根据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新形势,总结了“两弹一星”工程开创我国航天事业的理论与实践,我们国家的改革是一项比两弹一星更复杂、更巨大的社会工程。它包括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党的建设等子系统,这样多、这样复杂的系统需要互相协调、互相配套进行,尤其是需要科学的意见。他说“我们造人造卫星,如果没有科学依据,那么卫星早就打飞了,也不知道飞到哪里去了。”所以我们必须要用社会系统工程的方法,用电子计算机技术,研究分析改革进程中的问题,向中央提出

决策的科学依据。

早在1980年的时候,钱老就向中央建议要成立一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体设计部,就是为中央决策的参谋班子。由于复杂系统是有层次、有结构的,各个系统是分系统,但又是互相联系、互相作用的,因此各个层次的系统都要有自己的总体设计部。这就是说除了中央的总体设计之外,各个部委、各个地方、各个机关都应该有智能机构,有它的智库,他们对不同的方面、不同的问题进行系统的研究,向各自的领导机构提供决策的智力机制。总体协调、总体设计就是大家讲的顶层设计,它体现了辩证法统筹兼顾、全面规划、局部服从总体、全国一盘棋等原则,这就是总体设计的根本思想。

钱老说“我们国家改革过程当中有各种各样的问题,有各种各样的意见,怎么样进行权衡,怎么样决策,才能够符合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国民经济发展的要求,最后能够提出对大家来说都满意,并且符合规律的建议,这就必须要用社会工程的方法,只有采用这种方法才能解决问题。”据统计,目前全世界一共有6826家智库,美国有1828家,我们国家有426家,仅次于美国。我们国家的智库分为党政军的智库、社会科学界的智库、高校智库和民间智库这四大类。2013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指示,第一要把智库的发展提高到国家战略的高度,要作为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二提出中国特色精英智库的建设目标,第三要求我们探索中国特色智库的组织形式、管理方式,加强智库自身的建设,为中央决策提供高质量的智力支持,这是习总书记的重要指示。

根据习总书记的指示,结合钱老关于总体设计

部的设想,我向我们研究中心提出几点建议。第一,我们的目标要按照习总书记的指示,要为中央部门、地方的科学决策提供高质量的智力成果。我们的任务就是要运用社会系统工程的思想方法探索有自己特色的智库的组织形式、管理方式、研究方式。我们的研究方法是钱老总结出来的,叫从定性到定量的综合集成法。组织形式就是综合集成研讨,它是运用从定性到定量的综合集成法的组织形式,实体机构就是总体设计部。我们选择的课题应该是根据十八大三中全会《决议》提出来的重大战略问题,运用社会系统工程的方法,发挥多学科的优势,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进行有针对性的理论与实际结合的研究。比方说社会系统工程视野中的社会稳定、文化治理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我们研究中心也申请一个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就是“社会系统工程视野中的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社会系统工程方法是朴实的科学方法,是钱学森留给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希望我们通过我们这一代以及后面的努力把它发扬光大,为现代化建设做出贡献。

社会工程方法的核心是从定性到定量的综合集成法。这个方法怎么来的?首先从现代科学认识论、方法论,根据19世纪末20世纪初三个革命——逻辑学革命、数学革命、物理学革命,在这个基础上研究科学认知方法论。在这个过程中,产生了两个很有影响力的观点:一个就是逻辑理性主义,第二就是批判理性主义,它认为现代科学认识不是直接从经验出发的,而是从假设出发的。所以从这个看起来,现代科学的研究方法,它是由科学家个人进行的,它的执行程序体现了定量、定性,先假设,定量是由假设进行逻辑推演、数学演算,得到定性的结果。

现代科学的认识论、方法论,很重要的是什么呢?20世纪30年代以后出现新的情况,主要是科学技术朝综合化的方向发展,它高度融合,产生了综合性科学,像生物科学、社会科学、历史科学等。另外一方面又产生出很多横断性科学,像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这样一个新情况告诉我们,现代科学技术是一个统一的、完整的现代科学技术体系。这是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第一个特点。第二个特点是现代科学技术工程一体化,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科学、技术、工程成为一个系统的

整体,加速了科学转化为直接生产力的过程,所以这样一个系统就可以用这个图去表示,“基础科学——技术科学——工程技术”,这是一个循环的相互作用的系统。在这样一个科学技术发展的新的历史时期,依然要用科学的认识论、方法论进行创新性研究,这个研究是我们时代重大的课题。

钱老提出来的从定性到定量的综合集成法,就是新时期方法论的创新。突出表现在哪里呢?突出表现在系统科学,在很多的科学里面它异军突起,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像20世纪40年代一般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都蓬勃的发展,还有20世纪70年代耗散结构论、协同学、超循环论、突变论,等等。这样一些成就表明什么呢?就表明了现代科学是向整体化发展的,所以在这样一个新时期要在认识论、方法论方面进行创新。以钱学森为首的一批学界同仁,肩负历史的重任,经过20多年的努力做出了独创性的贡献。最早的一篇文章是钱学森、于景元、戴汝为联名发表的《一个科学新领域——开放的复杂巨系统及其方法论》,认为:复杂性问题的研究方法,现在能够用的,唯一有效的方法就是从定性到定量的综合集成法。

综合集成法的要点是什么?第一步是搜集与系统有关的情报、资料、数据和相关领域专家的实践经验。第二步是根据第一步得到的局部的知识建立模型,这个模型是定性的。第三步从模型出发,应用人一机结合,以人为主的方法,充分利用计算机处理信息的能力,发挥人特有的智慧,因为机器没有人的智慧,所以要以人为主,来实现信息与知识的综合集成,这就是定量的。第四步通过人一机交互,反复对比,逐次逼近,实现从定性到定量的认识,进而得到对模型的正确性做出明确的结论,得出对整个系统的整体的定量的认识。这样一个认识,实际上就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的科学体现。它的操作程序是这么几步,“问题—信息与知识—模型—计算机仿真—优化方案—决策建议”,总的是这个观点。

要实现综合集成法,它有一个组织形式和总体设计部。组织形式就是综合集成研讨厅,它的组成是由三个子系统:一个是知识体系,包括各种科学理论、专家经验、情报资料、统计数据、常识性知识。第二个是工具体系,就是以计算机为核心的多

种高新技术的集成与融合所构成的机器体系。第三个是专家体系，就是与问题有关的科学家与技术专家。综合集成研讨厅是人—机结合的智能计算机体系，它把专家和知识库、人工智能系统、巨型计算机组织起来，所以综合集成厅就是21世纪的民主集中制工作厅。我们党提出民主集中制，提了很多年了，怎么把它具体实现呢？综合集成研讨厅就是民主集中制，是辩证思维的体现。

它的任务是利用思维科学、人工智能、知识工程、数据库、知识库等信息科学技术成果，以人的创造性思维为中心，研究解决问题的方案，对于这个方案进行优化、预测、评估，然后形成有依据的、可以实施的方案计划，向中央建议。

它的方法就是近代科学方法时期的方法，它不是个人的，而是集体的。以前是个人的，现在是科学家集体，利用现代技术的工具。所以从定性到定量的综合集成法，是科学方法重大的理论创新。钱老从方法论的高度指出“这个方法是整体论和还原论的辩证主义，实践已经证明了现在能够用的，唯一能够有效处理开放复杂巨系统的方法，就是从定性到定量的综合集成法。但是近几年，国外也有人提出了综合分析方法，就是 Mela - analysis，对不同领域的信息进行跨领域的分析综合，但是他认为这个方法还不成熟，方法也太简单了，从定性到定量的综合集成法是真正的。

有了组织形式，还应该有执行机构，就是总体设计部，也就是我们讲的要做顶层设计。总体设计部的组成是按照刚才讲的三个部分，它的任务就是要使用从定性到定量的综合集成法，对系统进行总体设计。它的基本程序就是这样。

它的基本内容：一是根据上级的要求，技术发展的要求，约束条件、设计长期发展的方案，并且要加强基础研究。二是要对方案进行统筹规划、研究、设计、制造、实验。三是要从整体优化的角度，分析方案的运行，分解到各个分系统，协调分系统与总体、分系统与分系统之间的关系。四是确定方案并组织实施。

国家治理体系构建：一个分析框架

吕志奎

(厦门大学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

各位老师：刚才听了黄老师的报告确实很受启

发，他是我导师的导师，因为我的研究生导师是陈振明教授，陈振明老师的导师是黄老师。我是公共管理专业的，把自己的一些研究想法跟大家交流一下，希望各位教授批评指正。

我想从国家治理的视角来谈谈自己对十八届三中全会，打造中国崭新发展的战略规划，也是我们国家发展纲领性文件的一个理解。现代治理有一个创始人是罗茨，他是非常有智慧的一个学者。我们跟他的交流，不同的国土、不同的语境之下，不同文化背景之下对治理的理解是不同的，包括习近平总书记的一系列讲话，我们国家领导人对治理的理解实际上跟国外西方学者的话语内涵是不同的。习近平2014年1月1号在《人民日报》发表一篇文章，谈到十八届三中全会有关国家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这样一个深化改革目标。我认为他比较系统地解读了什么是国家治理，他从1949年建国以来中华人民共和国这60几年的历史就是怎么样去治理社会主义这样一个角度来理解治理，跟西方学者、西方话语体系下的治理概念是不同的。我自己感觉现在媒体、报纸、杂志上对国家治理体系，包括国家治理的概念、国家治理体系的要素、国家治理能力的要素以及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解读，我认为有一些学者是用西方治理的概念在演绎我们的国家治理，中国的国家治理体系应该怎么构建，中国治理现代化应该走向什么样的途径。对这些文章，要带着一个辩证的视角去看待。

按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建国60几年来，甚至于从社会主义诞生，社会主义怎么治理？苏联社会主义没有有效的治理，最后整个政权解体。包括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我理解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在中国的背景之下就是转变发展方式，因为中国经济所有行为都是政府行为，当然政府行为离不开一个前提就是一党执政，所以我们今天谈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就是一党执政这样一个政治逻辑前提，离开这样一个逻辑前提来谈什么是国家治理体系，什么是国家治理现代化，我认为都没有意义。我从本土的视角来谈一下我自己的看法。

基于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谈改革开放。这30几年来是我们国家治理的一个转型期，我把1978年—2012年国务院每一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做一个解读、分析。我理解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就是一份国家治理报告，从赵紫阳、李鹏一直到朱镕基、温

家宝,包括李克强,政府工作报告就是解决了国家治理的领域,它里面也谈到了国家治理现代化,它的意思就是讲国家治理的转型就是怎么去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路径。什么是国家治理前沿?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讲的东西就是国家治理的前沿,就是国家治理的领域。思考国家治理体系的构成要素或者说什么是国家治理现代化,最近习近平总书记在法国、德国的演讲中讲到历史是最好的老师。我们谈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和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一定要有一个历史的视角,否则撇开历史来谈国家治理现代化,因为不懂历史,就会借用西方的一些概念来进行演绎,我觉得这会误导人们。

我认为国家治理的核心是政府治理,政府包括执政党这样一个体系,它是整个国家发展战略的制订者,一个最大的资源动员者,包括思想舆论的引导者,还是封闭、整合、调控者。现在国内外对国家治理体系转型或者现代化推进路径,我归纳为五种视角:一种是价值塑造论或者是建设论。二是协作治理,协作治理视角从2000年到现在,美国公共行政评论,美国公共管理领域的一些学术期刊,它研讨的一个话题就是协作治理,讲到协作治理就是讲协同治理,它是多元主体论。从十八届三中全会到现在,人民日报的评论员文章一个主要的话题就是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核心价值体系的构建。一个人没有信仰、没有精神的支撑,什么事情都可能做不成,一个国家也是这样的。所以为什么提到文化强国,提升中国文化的软实力,这都跟我们的价值构建有关系。所以价值体系构建是国家治理体系构建的一个重要要素。三是制度建设论,国外的制度经济学、制度分析,国内也有一些制度学派。从制度构建的角度来讲,《第二次转型国家治理建设》这本书就是说中国以前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接下来要以制度建设为中心,是从制度建设论来谈政府转型,事实上就是要推进国家治理的现代化。四是治理工具论,我和陈振明教授关注的就是治理工具论,从治理工具或者政府工具的角度来谈国家治理的转型,要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必须要改进政府的管理方式、方法、手段。西方学者把政府管理的方式方法都贴上了治理工具的标签。五是财政转型论,包括这次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为什么?我们的维稳,我们提出要搞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保障和改

善民生,这都需要钱,没有钱什么事情都做不成。俗话说财大气粗,一个家庭财大,他就可以气粗,一个国家财大,在国际上讲话就更有底气。中国整个财政就是这个支撑,国家建设和国家安全的治理要靠财政。

有这么多研究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理论途径,我想把这五个视角综合起来。十八届三中全会有一句话“统筹兼顾、协同推进”,这几年我们官方的讲话很喜欢用“协同”这两个字。社会工程一定是系统论,系统要素的协同整合。这五种研究视角要走向一种协同构建,包括多元主体的协同。我有一个不成熟的观点,我们现在表述政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政治协商制度,未来中国的转型应该随着经济社会的转型,利益结构的调整,它对党也要做修正。未来是不是有这样一个调整,中国共产党领导、多党合作、多元主体参与的主体结构,这个性质就变了。

我提出这样一个框架图,把前面国内外学者对国家治理现代化推进路径的理解整合起来,提出自己的一个理解。从社会系统工程的视角来看国家治理体系构建,我构建这样几个维度的分析框架。

第一个维度是国家治理价值体系的构建。每个人做出的行为,包括国家治理主体,中国共产党有它的价值追求,民主党派有它的价值追求,NGO有它的价值追求,每个公民也有个人的价值追求,所以国家治理体系就是三个倡导24个字,包括国家、社会、个人层面,这三个层面怎么去整合,国家价值体系的构建,从精英价值转到大众价值,就是国家层面、社会层面的有机调和。

第二个层面是主体结构。如果把整个国家当作一个宏观的社会系统,我认为包括三大系统,国家、市场、社会,国家治理体系的构建一定是放在社会系统工程视角下面,从国家、市场、社会这三个公共层面来谈国家治理体系的协同构建。李克强把简政放权作为这一届政府开门的第一件大事,就是要激发市场活力和社会的活力,优化国家治理主体机构。我有一个观点,中国的民主政治没有必要走西方的那种突变式的道路,再过三十年、五十年中国的治理结构怎么变?它自然地会变化,这是第二个——主体结构。

第三个是治理体系。我们过去的制度都是简单化的,我认为未来要走向精细化。这次国家新型城

镇化规划 2014—2020 年，提出社会治理精细化，我觉得这很有意义。它直接的体现我认为国家治理工具的体现，国家治理工具体现的一个构建，我的理解是混合工具。过去是命令、控制、压力式的，混合工具是民主合作的、市场化的机制，社会化的机制，信息手段，包括引入一些企业化的管理方式方法，所以是混合型的政府工具。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四个治理“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我认为这些都是治理工具的一些体现，不要让潜在风险演变为国家的危机。我认为包括乌克兰、埃及、阿富汗、伊拉克出现的问题都是国家发展过程中面临的一些风险，国家政权体系没有有效地去化解这些风险，最后酿成国家的危机，那就是整个政权的崩溃和解体。所以我们谈国家治理现代化，我认为国家治理面临的危机，说明现在国家治理体系不够现代化，如果不有效地去推进它走向现代化，那就导致国家的危机，这对中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警示。

第四个是财政的支撑，要有公共财政。

信息转换：信息领域的普适方法论

钟义信

(北京邮电大学原副校长，国家 863  
计划信息领域战略研究负责人)

我非常高兴借这个机会向大家学习，同时也向大家交流一点想法。国家治理也好，社会系统工程也好，非常重要的就是要有正确的方法。我今天跟大家来探讨的题目是“信息转换”，信息转换具体一点就是信息要转换成知识，知识再进一步转换成智能，这个转换是求解复杂问题的普适方法论。

首先介绍一下信息转换的原理模型，这样可能会对信息转换有一个具体的探讨。发现问题，认识问题，在这个基础上去解决问题，这是有人类以来一直到今天，一直到未来，都是一个永恒的问题，总要不断地面临问题，认识问题，然后去解决。解决了老的问题，又会有新的问题，因此它是一个永恒的课题。

首先要发现问题。发现问题你要获得关于这个问题本身，还有这个问题所存在的环境，它的约束条件等等，要得到一些信息。于景元先生的文章里讲光有信息是不够的，信息是现象，你知道了很多现象，你不了解它的本质，那你还不能解决问题。

所以有了信息要通过一种转换方式，把信息转换成知识，得到了知识，意味着我们对这个问题有了认识，而且有了本质的把握，不再是停留在现象上，而是在质上对它理解。认识问题并不等于直接就能够解决问题，因此还要进一步明确你的目的或者叫目标，在这个目标的导引控制下把知识技术演绎或者叫激活，生成解决问题的策略。这个策略一方面要满足主观的愿望，人类的主观愿望，因为如果不能满足人类的主观愿望，获得更好的生存发展方式、更好的生存发展条件和环境，如果不能满足这样一种愿望的话，人类是不会接受的。但是同时又必须要满足、要符合客观的规律，主观的愿望和客观的规律两者融为一体，非常地默契，这样一种策略才叫做智能策略。有了智能策略，就意味着我们知道该怎样去解决问题，这就是信息转换很简练的一个模型，当然并不简单，因为这两个转换可以说充满着许多未知，充满着很多奥妙。

要把信息转换成为知识，它的本质问题就是由现象要上升到本质，由现象到本质的转换，这里有很多复杂的问题，当然从方法论来讲大体上是归纳，由大量的现象去归纳它们共同的本质。在复杂的条件下，也可能没有很明确、很可用的现代经典数学方法来用，因为一讲到归纳，大家可能想到数学归纳法。但是复杂问题条件下数学归纳法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那里面一些机制更加复杂，这是大家很熟悉的，所谓有限，所谓顿悟。顿悟也是它并没有经过一种数学的演算，但是凭借他的知识，经过某一种过程的理论得到了这个知识。涌现的复杂系统，大家都认为复杂系统从许许多多的输入得到一个反映本质的输出，这是一个涌现的现象，但是它的机制还在研究。因此模型看上去很简练，但是实际上在解决问题的过程并不是那么简单。

同样，由知识向智能策略的转化也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这个问题实际上是对事物本质的认识，要产生出解决这个问题，又符合主观要求又满足客观规律的一种智能策略，也是复杂的演绎过程，也许不是我们现在大家很熟悉的逻辑演绎，而是更加复杂的东西。有的看上去也许是一种直觉，有的看上去也许是一种灵感。所以这两个转换都是有质的飞跃，都是有比较重大的一些过程，而且有些到现在为止我们还没有完全把握这样的东西。

其中发现问题、设定目标，这两件事是一定要

靠人来完成的,这就是人的创造性,机器不可能自己去发现,为人类去发现问题,机器也不可能为人类设定一个合适目标,这是人的创造性的表现。你要有创造,首先要发现问题,如果不能够发现问题,就谈不上有任何创造。积累知识、解决问题,这个方面可以人机合作,以人为主,人机合作的方法去解决。所以信息转换是这样一种理解,我觉得可能是求解复杂问题的一个普遍适用的方法论。

其中“信息”的概念在这儿强调一下,不是我们大家现在所熟悉的信息论的研究,空间系统是只管形式,不管内容,也不管价值,只要把模型在噪声背景下如实地传到地方,通信的任务就完成了,所以纯粹是形式化的。目前计算机自动化系统,几乎所有信息系统都是形式处理,但是如果仅仅是形式处理,你要解决一种既能满足人类的主观要求,又能够满足客观规律的这样一种智能策略,基本上是不可行的。在复杂的情况下,信息必须是一个新的信息概念,这就是我们许多年所做工作的一点收获。

我们有一个概念叫“全信息”,但是“全信息”并不是什么东西都弄齐了就是全信息,它有非常明确的概念。比方我们面对一个客体,看到这个客体现在处于什么状态,将来处于什么状态,这个状态到下一个状态之间的过渡转换按照什么方式,它的状态和状态转换的形式。我们真正要去对付它的时候就要用某种符号去描述它,所以状态我们用符号去表述。状态按照什么方式或者符号按照什么方式演变成为下一个状态的符号,这个信息就叫语法信息。当然这是一个借用的词汇,有很多人说你这个只能用在语言学,其实不是的,语言学也是一种符号学术语,而符号学是一个普遍的符号,图像也可以看成是一个符号,数字也可以看成是一个符号,它是一个普遍的理论。语法信息只涉及状态和状态转变的方式的形式,如果这个主体把这种状态和状态转变方式,跟它所代表的真正的客体联系起来以后,你就可以看到它出现的含义,就是这个状态是什么意思,如果没有客体跟它联系,0就是0,1就是1,你不知道0什么意思,1什么意思,可是一旦把0、1跟它的客体去比较联系,比方说房间这个灯是开还是关?是明亮还是黑暗?比赛是赢还是输?它就有内容,这个内容就是它的语义信息。

再进一步把这些形式和内容跟用信息的主体联系起来,那这一套对这个主体的目标而言,到底是有利?还是有害?还是无关?这里所显现出来的,就是语用信息。它有明确的概念,形式、内容、效用或者叫价值,从信息的概念讲就是语法、语义、语用信息三位一体,这样一个信息最后能转换成智能化策略,为人类解决问题提供指导。全信息就是指它们的三位一体,现在我们已经把怎么样产生全信息这样一个理论和方法找到了。

引申一下信息转换这种方法论的意义。质量转换是在物质科学时期非常重要的一个定律,它可以把劣质的物质资源通过这种转换的规律,把它转换成优质的材料,优质的材料就可以提供给我们做各种各样的工具或者机器,或者设备等等。特别是到了近代,还发现了一个能量转换的定律,它就可以把低效的能源或者能量资源转化为高效的动力产品,这样我们就可以把它装配到机器里面,让机器自身能有动力,可以把人的体力解放出来。材料可以把人的体力替代下来或者解放出来,信息转换就是能够把原始的信息资源,刚才讲现象意义上的资源,通过这个规律转换成解决问题的智能策略,这样使得我们能够去解决一个问题,而且满足主观的要求,又满足客观的规律。我们觉得应该高度重视信息转换这个规律,其实这一点跟刚才黄先生报告的综合集成研讨厅或者定性、定量相结合的综合集成方法可能是异曲同工,但是这个就很具体,告诉你掌握两类转换的方法。

### “社会控制论”探讨

涂序彦

(北京科技大学计算机语系统科学所  
所长、中国人工智能学会荣誉理事长)

关于“社会控制论”的研究对象、学科内容、科学方法、学科构架。

钱学森先生曾经提出建立与发展我国社会控制论学科的问题,并且预言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一门新学科终将诞生,这就是社会控制论。社会控制论是什么呢?是研究各种社会系统,也就是广义社会系统,它是控制过程的运行规律和理论方法的一门新学科。

我在20世纪80年代有幸得到钱学森先生的亲自指导。为了实现钱学森先生关于社会控制论的科

学意见，我在1981年写了“社会控制论初探”。今年3月份黄老师要我参加这个会，所以我又做了修改，今天探讨的内容就是社会控制论的研究对象、学科内容、科学方法、社会构架。

社会控制论的研究对象是什么呢？控制论中关于控制的概念是广义的，这意味着控制、调节、操纵、管理、指挥等等，社会控制论的研究对象应该是广义的社会控制系统。广义的社会控制系统就意味着社会领域各种控制、调节、操纵、管理、指挥系统。

社会控制论研究的对象很多。

第一是国家行政管理系统。世界各国都有国家行政管理系统，而且具有共性，现在社会普遍采取多级递阶控制的结构方案，不同的国家各有特点。如何能够取长补短，改进国家行政管理系统呢？大家知道“控制论”，这个词本来就有管理国家的艺术的含义，所以国家行政管理系统应该是社会控制论的重要研究对象。

第二是国民经济管理系统。关于国民经济管理系统有的国家是采取集中控制，有的国家采取分散控制，各有优缺点。如何使分散控制和集中控制相结合取长补短，来探讨适应我国国情的国民经济管理系统呢？这既是研究的课题，也是它重要的研究对象。

第三是科学技术研究系统。科技水平制约社会进步、经济发展、人民生活，国家科技管理体制、方针政策，对科技发展影响很大，如何准确管理科学队伍，是按学科来组织还是任务组织？各有优缺点，这也应当取长补短，相互结合。如何协调基础学科、技术学科、应用学科的关系呢，使其能够协同发展、相互促进、共同进步？如何博采众长，改进我国的科学技术管理系统呢？这是社会控制论的重要研究课题。

第四是人口控制管理系统。我国是人口最多的国家，这既是优势但又是问题，如何控制我国人口资源的数量和质量，不仅关系当前的社会状态，而且影响子孙后代。如何对我国人口发展进行分析预测，为制订合理的人口控制策略、法规，提供科学依据，如何提高我国人口控制管理系统的效能，这都是社会控制论的重要研究课题。在这方面，宋健同志有过很好的研究。

第五是污染控制环境保护系统。污染控制、环

境保护既是技术措施，也是社会问题。如何对工业、城市、河流污染进行有效的监测分析？如何对社会环境、自然环境、空气质量、水质等进行定性定量的综合评价？如何对环境变化趋势进行预测、预报？为高效的污染控制、环境保护策略方案提供科学依据，如何建立污染控制环境保护管理系统？这都是社会控制论研究的重要课题。

第六是社会公共服务管理系统。现在社会许多公共管理系统，比如医疗卫生、公共服务、商业服务、银行服务等等，都与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直接影响社会安定、公共秩序。如何根据我国人口众多、地大物博的国情，组织管理各种社会公共服务系统，提高服务质量，工作效率？这也是一个重要的课题。

第七是社会安全控制管理系统。为了保证社会安定、人民安全，需要建立社会安全控制管理系统，比如公安部门、人民法院、警察局、武警部队，如何提高社会安全控制管理系统快速反应、有效出击的能力？如何分工合作，协调配合，协同维护社会安定和人民安全？如何高效、迅速、彻底消灭各种不安全的社会干扰因素？这是社会控制论的研究重要对象。

第八是社会网络信息控制管理系统。现在社会进入信息化、网络化时代，国际互连网、内部互联网、外部互联网，人们社会生活实现信息化、网络化，在国内外提高了相互联系、信息交流、协作协商、办事购物的效率，节约了时间，压缩了空间，增加了机遇，发展了事业，这是好处。但是也带来社会信息安全的问题，如信息网络的病毒传染、骇客入侵，黄色污染，坑蒙拐骗，等等。因此，如何建立高效的社会信息管理控制系统？这是社会控制论面临的新问题。

关于社会控制论的学科内容。社会控制论主要研究社会系统控制过程的问题以及相应的控制信息采集、传递、变换、处理、利用的理论方法、实现技术。这是社会控制论与社会学、经济学、科学学、人类学、环境学、园林学、军事学、信息学等学科的分工和区别之处。实际上社会控制论是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的一门边缘科学。

社会控制论的基本科学内容应该包括三个方面：第一是要建立社会控制系统的模型，第二是社会控制系统分析，第三是社会控制系统的综合、设

计、规划,要在建模分析的基础上才能做这个事情,刚才黄老师也谈到了这个事情,以便反映人们关于社会控制系统的认识、改造、发展过程。

社会控制系统建模,由于社会系统具有复杂性、主动性、不确定性,难以用传统的、简单的数学方法,所以需要“大系统控制论”的广义模型的建模方法,来建立社会系统的广义模型。广义模型的概念有几个:第一是集成模型,所谓集成模型就是由知识模型、数学模型、关系模型相互结合,通过软件集成来形成集成模型,这也就是说问题虽然复杂,我这个建模可以有十八般武艺来对付。知识模型就是用人工智能,知识工程的方法与技术,表达人们的定性知识、经验知识,进行逻辑推理、求解有关的问题。数学模型、关系模型,用逻辑学方法建立的各种关系模型,可以灵活运用。

第二是控制论模型,任何系统不管有多么复杂,都可以用这样一个简单的图来表示(略),也就是说控制的模型和被控制的模型。传统的控制理论主要是被控制对象的模型,很少研究控制者的模型,特别是人,所以这是一个问题。控制者的模型可以用人工智能、专家系统的办法来建立,建立专家的控制系统。

第三是变粒度模型,因为社会系统很多时候都是很大的系统,不同的层次,对问题分析的力度或者单元是不一样的,比如国家级的,那是国家的社会经济指标,省级的、县级的都不一样,是很多级的,因此要有变粒度的模型来适应。

第四是智能模型,过去我们提出我们是发展中国家,现在我们国家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在国际上有很多的评论,说今后十年要看中国,这里边就必须使得我们的这些模型、这些方法要能够适应变化,这样的话就需要有智能。比如自学习模型,能够进行自学习来跟踪社会系统的变化发展,等于自适应。有自组织模型,可以利用模型库和它的管理系统,根据用户要求在模型模块的基础上来组织适合于实际社会系统的模型。

社会系统分析,有了模型以后就可以进行。一方面对已经有的社会系统进行定性、定量、动态、静态的分析,对社会性能进行估计评价,对社会系统变化的动态过程进行分析、预测,为改善现有的社会控制系统的性能,了解社会系统发展趋势,提供科学依据。其中最重要的,基本社会单元是人,

也就是人的控制系统分析是这里面的重要问题。研究人的控制系统,要研究它的控制系统采取的能力,这个也有主动性,是主动单元,这个是社会控制论的重要问题。在社会系统中,不仅有个体还有人的群体,也就是说这里面有人一人系统,还有人-机系统。它的不确定性分析,就意味着模糊性和随机性,关于事物概念内涵的不确定性,事件发生与否的决定性,但是它的概念本身是明确的。

社会控制系统的综合。综合是意味着对有待改进的,尚待筹建的社会控制系统,制定决策方案,进行规划设计,目的在于实现最优化,制订最优化方案,采取最优化方案,实现最优设计,建立最优化的社会控制系统。这里的关键问题是如何协调,如何适当处理社会系统的复杂关系,在各小系统局部最优化的基础上,通过协调,实现社会大系统的全局优化。

通常,社会系统都是复杂的大系统,为了完成社会控制可以采取不同的控制方案,有集中控制、分散控制、多级控制、多层控制、多段控制,根据控制论的需求进行结构设计,采用结构模型进行结构分析,建立合理、实用的社会控制系统结构模型。社会系统通常都是多变量复杂大系统,缺乏有效的协调控制,往往是系统运行不正常、效率低的主要原因。在工程技术领域中屡见不鲜,生产工艺过程不协调、不平衡,引起零件积压,质量下降。因此研究适合国情,合理高效的协调原则,协调策略、协调方法,以求正确处理各种人民内部矛盾,相互协调,统筹兼顾,减少内耗,实现社会系统的协调化,这是社会控制论的核心内容。

社会控制论的科学方法。社会控制论是工程控制论的继承、运用、发展,因此在工程控制论当中行之有效的科学方法,也可以移植、引用推广到社会控制系统。需要注意的是,我们既要看到社会系统与工程系统的共性,也要注意社会系统与工程系统的各自的个性,在移植、引用工作中系统概念、科学方法都不能生搬硬套,需要探讨发展适用于社会系统的新的科学方法。

我们这里建议一些方式方法:一是“模糊逻辑方法”,社会系统关于人、事、物的认识具有模糊性,所以要用模糊逻辑方法。二是“概率统计方法”,社会系统事件是否发生具有随机性,所以采用这个方法,用概率分布统计模型来描述,概率

分布曲线来表达社会系统的随机性。三是“网络图论方法”，以网络图来表现，这有助于研究社会系统结构稳定性，探讨社会系统对经济结构、社会系统体制改革、机构调整具有实用意义。四是分解协调方法，社会系统是多级控制系统，它存在着上下级关系，所以采用分解协调，实现大系统的多级优化。先将大系统分解很多小系统，然后分别实现它的局部优化。协调就是在协调基础上实现大系统的整体优化。

社会控制论的学科架构，根据以上论述可以建立社会控制论的学科架构。社会控制论研究对象是广义社会控制系统。社会控制论的学科内容是社会控制系统的建模、分析、综合。社会控制论的科学方法，模糊逻辑、概率统计、图论网络、分解协调方法，社会系统控制构架包括研究对象、学科内容、科学方法、学科构架。

#### 治国科学原理

孟凯韬

(西北大学哲理数学研究所所长)

治国科学原理是我研究的一部分。

哲理科学是以世界十二大规律为基础，根据阴阳的概念，把阴阳的概念和哲理科学相结合，提出世界十二大规律。

治国科学原理是哲理科学的研究内容之一。哲理科学是我创建的一门新学科，但它已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科学，也不是一门单独的学科，而是一门以辩证思维为主导，对哲理进行认证，使人们的认识由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跃向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它涉及诸多研究领域，包含一个学科群的大科学，基于象数结合世界全息太极图，所证明和发现的世界十二大规律是它的立论基础。治国科学原理就是世界十二大规律在国家治理上的具体应用。象数结合世界全息太极图，太极图是象和数相结合，这是哲理数学与阴阳相结合而创立的。世界上一切事物无不具有既相互对立又相互依存两个方面，其中包括既相互对立又相互依存的两种基本属性。且对于既相互对立又相互依存的两种基本属性而言，只有在极限情况下，二者是非此即彼的，其余都是亦此亦彼，一分为二只是一种粗略的划分。整体发生两极分化，必然出现中间状态，故为三部分，两极再发生变化即成为五部分。

同一个事物既对立又统一两个方面，其消与长是同时发生的。同一个事物既对立又统一两个方面，在数量或强度上是势均力敌的。顺势变化和逆势变化是交替发生的，且顺势变化容易，逆势变化难。这是物极必反的规律。

量变质变规律。量变是质变的前奏，质变是量变的必然结果。事物从发生到终结，其演化周期是相同的，但是演化周期所经历的时间存在较长与极短之分，较长即是渐变，极短即是突变。事物分化和浑然一体是交替发生的。

差异永存规律。世界上的事物差异永远是存在的，不会消失的性状无穷规律，世界上的事物，就性质和状态而言是无穷无尽的。

否定与否定规律，事物由处于混沌状态经过分化与和合，又进入新的混沌状态，混沌状态与前一种状态既存在同一性又存在差异。

世界十二大规律是世界万物发展的总规律。

根据十二大规律提了九条原理：

一是治国与中医治病具有同一性，治国犹治病。治国也和治病一样，只有完全遵循事物客观规律，而不用任何偏见，方可治理好。五脏是人体的核心网络，经络通过内联脏腑，外联四肢，构成整体网络。国家也包含一个核心网络和一个整体网络，国民经济系统是国家的核心网络，社会五大文明是国家的整体网络。从1949年以来，对阴阳和五行的概念都解释错了，按照西方来理解它是错的，中医书上说五行就是五手五指，这是错的。阳性容易向左生，化火，阴性向下，化水，中心化为土，这是原始意义。

二是文化与人才是强国之本，资源、能源是发展之基。按照中医理论，精血是生命之根，气是生命之本，津和液是维持生命活动的基本物质。对国家而言，文化与人才如气与精血，文化与资源如气之与津液。

三是国家富强的关键在于国民经济诸系统平衡和协调。这五个系统都是按照五行的延伸意义，比如交通、运输、金融、信息、商业这是润滑作用，政党、政府、军队、公安、司法，农林牧副渔纳入水的范畴，科技、卫生、体育、文化纳入木的范畴，制造、加工、建设纳入火的范畴，这是纳入到五行的框架，按照五行相生相克来说明他们之间的关系。

四是社会进步的关键在于五大文明平衡和协调。五大文明就是政治文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生态文明、伦理文明,它们之间的关系也是按照五行相生相克来研究。

上述两个五行系统都是极其复杂的社会巨系统,将其纳入五行框架,是将复杂问题变简单最便捷的方法,对于复杂巨系统,只有将复杂问题变简单才便于研究,从定量角度而言,我在《哲理数学概念》中提出一整套的方法,这个方法就是把定性和定量相结合。

五是限制公权力和惩治腐败是政通人和之保证。按照顺逆转换规律和物极必反的规律,任何政权在建立之前都是逆势向上,政权一旦建立,就意味着达到上极限,旋即转为顺势向下、享乐主义、特权思想等相伴而生,政权建立之后,如果对权力加以有效的制约,那么就可拮抗顺势向下的势头,防止走向反面。如果能够有顺向下转为逆势向上,就可以实现复兴,否则就会一直顺势向下到覆灭。

六是公正与平衡是国家长治久安的基本条件。社会根本问题不在于平等,而是在于公正,公正并不等于平等,平等也未必公正。公正既包含绝对平等又包含相对平等,基本权利绝对平等,非基本权利相对平等才符合公正原则。一般地讲,人为分化与自然分化的同一就是公正,人为分化与自然分化的对立就是不公正,就会产生关联偏差,关联偏差是一切社会矛盾的根源。

七是逆势向上,顺势而为是国家历久不衰之策。按照顺势转换规律,向上是逆势的,向下是顺势的,顺势变化一切容易,逆势变化难,从事物发展角度而论,顺势即顺着增大之势。要走向强大,务必逆势向上,要完成某种任务,就必须顺势而为。

八是构建和谐、创新型社会,非科学治国莫属。国家不论大小,也不论社会制度如何,稳定和发展都是不可或缺的,而且属于压倒一切的重要地位。然而,只有建立在和谐基础上的稳定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稳定,可以持久的稳定。只有建立在创新基础上的发展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发展,可以持续的发展。因此,和谐和创新是国家长治久安和繁荣昌盛至关重要的必要条件,是治国的根本大计。将科学思维与哲理思考贯穿于立法、决策和执法、管理的始终,便是科学治国的基本内涵。而科学治国则

是建设文明社会的根本之所在。

九是根除腐败,深化改革,实现文化复兴是国家的中兴之望。按照政治周期率,所谓中兴,即从下极限转为逆势向上,而进入新的发展周期。一直保持逆势向上,繁荣就会持久,否则就是短暂的。中国自从1949年以来,政局有两次达到下极限,即“文化大革命”时期和中国共产党十六大以前,从而出现两次中兴,一次是粉碎“四人帮”,以平反昭雪,解放思想,改革开放,繁荣经济为特征。一次是以战胜“非典”为转折点,以和谐社会、科学发展、深化改革、惩治腐败为特征。前者仅持续12年,至胡耀邦去世又急转直下,后者尚在进行当中。

中国当今的状况,就如同一个病人邪气太盛、元气大伤,按照中医的原理,切不可用补法,只治以去血兼以调气并大补元气。改革就是调气,振兴中国传统文化就是补元气,因此根除腐败,深化改革,振兴中国传统文化是唯一可救中国之法,关键在于能否解决问题,当且仅当腐败基本铲除时,始可论发展。

#### 推进文化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金元浦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社会系统工程研究中心研究员、文学院教授)

前面的大师们都谈了很多非常宏大的、基础性的、学科建设性问题,我谈的是一个小的有限范围的主题,那就是“文化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谈一点自己的看法。

关于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在我们这一届新的领导集体中还是有一些自身的特点,也就是说在三中全会《决定》中,它的最大创新是提出构建国家治理体系和实现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我想谈这么几点,它的特点是顶层设计、辩证施政、历史理性、改革激情。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实际还是依照历史理性,面对历史和现实的中国实际,不冒高,不空想,不菲薄,也有自信,来选择最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在这个世界上,说到底还是只有中国人自己最了解中国的实际情况。

特别谈到改革,习近平、李克强都谈到改革是问题倒逼产生的。今天的中国确实存在许多问题,

我们面临的的是一个中国近代历史上最大规模、最大幅度的变革。过去我们说战争时期有那么大的变革，实际上今天又是一个近代历史到今天规模特别巨大、幅度也特别大的一个变革，一个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环境急剧变化的转型期，它的关键词是转型期。如果我们不是在这样的转型期，那可能很多的问题就会平稳的发展。我们经历的是21世纪全球最大城市化变革的大潮，西方一些著名的理论家也特别谈到，全世界有两大最大的事情在21世纪：第一个就是美国的信息化，美国新经济所发展的信息化，所带来新世界发展的变化；第二个就是中国的城市化，中国城市化发展过程中现在已经到西方人预计在未来世界最大型和重要的城市中，有75%的城市将会在未来成为世界上最重要和发展最快的城市。问题不正常，所以我们今天讲反腐、拆迁问题、上访问题、雾霾问题、失联客机的问题，甚至婴儿的疫苗也牵动无数人的心，这是因为切身，因为人道和我们对于人性的关注。因为我们追求一个成熟健康社会的管理水平，所以会有这么多的问题，转型期确定了这样一个历史的和当下的社会变革。

改革是一系列问题倒逼产生的，上升一点从哲学角度看看，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第一前提是问题的问题，意思是说，不仅仅是我们当下这样一些面对的现实问题，而是在这个问题中我们有一个如何看待的问题。我们已经有过几届领导人，每一届领导人是如何看待这些问题的，问题放在这里，关于问题的问题就是你如何设定问题这样一个前提，我们把它叫做问题的问题，具有首要性。因为具有对于问题理解的构架和思考，我们才能够真正发现问题的关键找准问题，特别是要依据什么来判定这些问题，选择什么样的问题为核心。比方说过去对于上访的问题，尽量把上访的人压在原来的地方、原来的城市，这是最好的解决方式。但是现在我们讲了，上访是每一个人的权力，不能够再对上访者进行围追堵截了。是什么解决了这个问题？是因为我们对问题的问题有了一个新的考虑、新的框架去考虑。

选择什么样的问题为核心的问题？它的理论设计和构架是什么？用什么样的思路体现原则，去确定何为真问题、大问题和主问题？国家治理最重要的理论贡献应当是整体把握、宏观设计、全面推

进、点上突破。在治理方式上我认为以习近平为代表的新的治理方式，他是采取了辩证施政、执两用中、疾徐不二、稳步推进的战略。在文化的理念上采取了兼顾中西、通古开新，努力寻找发展文化和发展产业经济与普惠人民大众之间的平衡点，寻找历史与现实的平衡点，速度与效率、发展与公平、大与小的平衡点，国内与国外的平衡点，这是一个新的、辩证施政的风格。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一个非常巨大的课题，文化只是其中一支。当然它的总体发展不应该独立自行去发展，而是应当从五位一体的宏观整体上进行文化的改革，这里的顶层设计就是把握的关键。而顶层设计中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出发的辩证施政，把握全局，这是新一代领导集体推进文化发展中的重中之重。这是第一个要强调的，是在五位一体的背景下强调顶层设计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这样一种发展方式。习近平也提出了五大关系用这种方式来对国家文化治理体系进行新思考，包括国家文化治理体系的总体文化战略规划的顶层设计与文化分层对接的关系。

第二个关系，文化治理体系的整体政策安排与具体的文化政策关系，国家文化治理体系的系统政策链条与具体政策环节的关系，国家文化治理体系的政策统一性与政策差异性的关系，国家文化治理体系的长期性政策与阶段性政策的关系，五大关系确定了我们的方法论方式。

关于文化的事，习近平也说过很多，他提到文化的力量，特别提到文化要成为经济发展的助推器、政治文明的导航灯、社会和谐黏合剂，这些都是一些新的见解。特别是他提出的“中国梦”这个思想，还要看清楚他关于改革的事业，如何让它上升，以昂扬的方式来推进我们的事业，所以改革的事业是一个充满激情的事业。这个激情也是习近平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也就是在新一代的领导集体下在改革创新方面有一种澎湃的热情夙夜为公的勤政躬行。他提出的中国梦，体现了新一代领导集体的对信仰的真诚，对理想的职守，对人民的热忱，对成功和胜利的坚信，焕发了中国共产党对公仆的自觉，对于百姓的尊崇、关爱与信任。

我们看到中国梦的核心里头有一个最大限度，就是最大限度地动员一切积极因素，寻找全体人民的最大共识，找到中华民族复兴这一民族复兴的最

大公约数。这个最大的公约数就指出这样一个看似平淡,甚至并不是在提出之初有什么惊人之举的东西有了更多的力量和内在的含义。尤其是它在这里要更大的把所谓我们在现在中国的状况之下,不管是左、中、右,让一切活力竞相迸发,这是它更具有一个宽泛的动员令的意义,以改革开放这一民族最大共识来寻求最大的公约数,推送正能量。

整体构架是这样的,总纲是顶层设计、辩证施政。具体内容从三中全会的文件看,文化治理可以分为几个最重要的部分:第一是文化体制改革,这是我们国家体制改革重要的组成部分,坚持体制改革在核心价值观的指导下,在文化的总体发展和繁荣中间推进新的体制。第二是市场化改革,推进文化产业、创意产业资源优化配置的保障。第三是以民为本,加快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建设,这是整体文化治理结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当然在这里市场化的改革和公共文化体系的构建构成了两个方面,我们叫双轮驱动,它是一种对位性的发展,一方面要强调以民为本,公共文化服务的建设,另一方面也要考虑到在市场化条件下整体发展文化产业、创意产业、创意经济,以市场化方式来推动文化的发展。

一是文化治理体系,首要任务是文化治理改革,我国文化体制的改革要创新体制,转换机制,面向市场,增强活力。在管理体制和文化生产经营机制上提出新的思路,所谓管与办之间,特别强调了“管”字上下工夫,以制度管人,而不再办文化,办产业。

二是文化市场和文化创意产业是整个治理体系中比较新,也一直在推动的发展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要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所以这一次的理论思考和整体的发展方式有很大的变化,提出了在文化的产业发展之中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当然政府发挥什么样的作用?仍然是要发挥管的作用,而不是办的作用。在治理的体系中要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中要对于国有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小微企业等等文化的企业给巨大的支持。

三是文化产业、文化经济之后特别谈到了文化治理体系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公共文化服务。建立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提供公共文化服务是保障人们的文化权利的最基本的方式,它是均等化的,它

是共同享有的,它是基础性的而不是高端的,不是独个的,它是满足这个要求。而这些年我们有时候会忽略公共文化体系的建设,现在公共文化服务的体系获得了新的关注焦点,同时要把文化创意产业的市场化运营和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二者做一个对位性的发展,在普通人民群众中要强调的是更多地公共文化服务,在特殊的需求、市场化需求中要强调文化创意产业的市场化发展的动力机制。

四是国际化视野,习李新政里特别谈到文化的进一步开放,扩大对外文化的交流,它是两个方面:一个是更多的走向世界,来建设一个具有全球话语权的这么一个新的中国话语体系;二是用市场化的方式,用文化贸易的方式走出国门,走出去,建设一个文化对外贸易的新的格局。这个格局中央也采取了很多措施。2014年3月17号国务院刚刚发布了文化贸易如何走出去这样一个新的文件。关于文化创意产业,在发展过程中如何以创意设计总体提升我国二产的发展水平,如何以新的创意设计来提升文化产业自身的升级换代。这是两个升级换代,它具有一种基础性的作用,就是原创和原创力。

#### 复杂性研究——转变思维模式的一个重要方向

陈禹

(中国人民大学国发院社会系统工程研究中心  
研究员、中国信息经济学会名誉理事长)

我想借这个机会说三件事:第一我为什么要考虑这个题目?第二是我的结论,不讲过程;第三是提供一些信息。

第一,我为什么研究这个问题?我不是搞理论的,我是干实际活的。我是黄老师的学生,自然辩证法听黄老师讲的。我是学计算机的,后来又搞信息管理研究。从实际工作中,我就特别感觉到方法很重要,所以正因为这个原因,和苗东升,我们当年一起去听钱学森讲学班,当时人大去了四个人,所以从那时以来对方法论一直特别感兴趣,我还算是系统工程这个圈里的人。

从系统工程到复杂性研究,我认为是一个转变。从国际上来说,大概是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确切地讲就是系统研究得到大家关注以后,我曾经讨论过这个问题,我放弃了复杂性科学这个词,而用了复杂性研究这个词。光说系统工程味道

不够，因为牛顿力学也叫系统，所以特别强调复杂性。国外就更进一步，干脆整个研究方向就叫复杂性研究了，但是有一次我们在开会的时候，实际工作的同志听我说完这个方法论问题以后，就提出批评，就是说你又回到宏大叙事去了。大家知道宏大叙事是个贬义词，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总还得有个方法论。今天各位老师都讲到对于方法论的重视远远不够，所以我就在各种会上反复强调要充分认识复杂性。

正好南非有个学者出了一本关于复杂性的书，我看了以后很有启发。他给复杂性定了十条，咱们老说这个事复杂，到底什么叫复杂？我从实际工作角度，也不想搞宏大叙事，我就给它缩减成六条，这是我的一个主要的观点。

复杂性到底怎么来的？这是我的结论，我不说过程，从我们搞实际工作的角度来看，当我们说某个事情复杂的时候，我给它归纳了六条。

第一是概念的问题，我这儿写的是边缘模糊化。换句话说，就是客观的事情不是非此即彼的，有很多亦此亦彼的事情，就是反对二元论，讲究多元化。边缘的模糊化，索罗斯在这方面都有很多论述，他讲过一句话，他说绝对对立的二元论，好多是我们自己的概念造成的，所以二元和三元确实是有很大差别的。

第二是质的多样性造成的。我们经常把不同质的东西拿一个东西来比，如评职称要把文学界和信息学院的文章来比，这就是把不同质的东西非得往一块放，最后扯的不亦乐乎。由于忽略了质的多样性，造成了复杂性。

第三是视角的多样性。有不同的观点，比如我们在经济学中讨论一个问题，你说唯 GDP 是错的，那你说怎么办？有一个朋友提出来，品种是不是指标？多样化是不是一个指标？当我们发现新的视角的时候，我们就能够解决这个复杂性问题。

第四是层次的作用。不同的层次，如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实体经济、虚拟经济。

第五是时间的作用。我们是不是把所有事情看作是一个发展过程，时间有作用没有作用？200 年前的经济规律和今天的经济规律有没有差别？有很多问题需要讨论，到现在我们讲分工还是亚当·斯密的那个分工，多少年了。现在你上淘宝网上看看，看看阿里巴巴的平台，它那里的分工有很多不

同的特点。

第六是信息的作用。由于信息的作用，由于信息的不对称，由于信息的放大作用和马太效应带来的复杂性。

有老师会问，说你这件事是怎么来的？我这个 PPT 后面有另外两张图，第一张图是复杂性怎么来的？第二张图是说传统的理论思维怎么违反了这六条，我举的例子是人大经济学教科书，第三张图是怎么对待复杂性。

这事是怎么来的？其实是从黄达校长去年年底得奖，我这个东西是从金融学院的网站上下载来的。黄校长去年得了一个全国的经济理论创新奖，这是当时他发奖时候的情况，黄校长讲了一段话，我特别有感触。黄达校长的话有这么一段，“然而面对现实经济社会生活中的困惑，无论是国内的还是世界的，却往往使人感到深入本质、高屋建瓴的理论创新不怎么多见，似乎精良的经济学武器还不如过去的杂牌武器”。是否可以这样的判断？不在于中国经济学人没有掌握好经济学的武器，而是面对当今世界的新发展、新课题，世界的经济学显出有点迟钝、有点保守。这类问题显然不是制订几个计量模型能解决的，同样也不是简单重复经济学本身那样论证几千年、几百年的规律、原理所能解决的，这里需要不是在于细枝末节，而是在于提升指导经济学的基本思想，在于寻求哲理、宇宙观、方法论这样的指导思想层面寻求新的突破。

#### 社会治理是系统的社会工程

王宏波

(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院长、社会工程研究中心主任)

我感觉到人民大学是新兴社会科学的发源地，研究国家治理，包括了方方面面，外交、军事、政治、国际关系都在里面，我们的研究范围还是窄一点的好，所以这是一个实用主义的视角，当然社会治理也是国家治理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

大会题目是社会系统工程，我为什么用的是社会工程？有两个理由：一个是钱学森曾经写过一篇文章《组织和建设社会主义的技术——社会工程》，1979 年《经济管理》杂志刊发的，这是一个理由。另外一个理由，我们学校有社会工程研究中心，所以我也试图从社会工程的角度来理解社会

治理。

研究背景,过去我们曾经提出的是社会管理,现在提出的是社会治理。从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究竟是一个什么关系?这是我思考的第一个问题。社会管理有什么特点?我看了一些文献资料,管理最基本的含义是组织、协调、服务、监督和控制。社会管理就是对社会进行组织、协调、服务、监督和控制的过程,这个定义用在社会管理上明显地感觉到有一点局限,这个局限是什么呢?它忽略了市场因素,还有其他的社会主体的自我管理和自治的因素,所以今天我们要提出社会治理可能是要超出过去的社会管理的理念,尤其是强调社会自我管理和自我调节,和多元社会管理主体相互协调的共建社会秩序的这样一个社会活动,这是对社会治理的一个理解。

从社会治理的方面来理解,可能有这样几点:治理不是一套规则,也不是一种活动,而是多种活动构成的一个过程。治理过程的基础不是强调控制,而是强调协调。治理涉及公共部门,也涉及私人部门和其他的社会组织。治理不仅仅是一种正式的制度,还可能非正式的制度、习惯、文化和持续的互动。所以关于治理的理念和管理的理念,治理更宽泛一点,治理的内容更丰富一点,治理的指导思想更强调多元主体。还有一些区别,我就不详细说了。

治理和管理是什么关系呢?最近我听到一个说法,一谈治理就不能谈管理,我认为不能这样说,职能和管理还是有联系的,因为若干个不同管理主体相互协调的互动才构成了治理体系,所以治理当中是包含着管理的要素。比方说一个商会,它要把商会成员联系起来,它有一定的规制,要反对市场欺诈,反对你私自抬高价格或者降低价格,所以它还有管理的功能。我们谈治理还是不能够放弃管理这个要素,但是把它包含在治理体系之中,这是我的一个观点。不能说现在从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管理这个词就不能用,我们要把它放到合理的位置上。

关于社会治理和社会工程活动的关系。我们研究社会工程、社会系统工程,它是如何实现社会治理的一个学问。这个研究对象,就是建构一个新的管理主体、管理客体、管理体制、管理机制、激励环境、架构、过程、秩序的这个系统结构和运行的过程。比方我们现在形成一个新的社会治理体系,

它由多元社会管理主体构成,它们相互之间的关系如何建构,这就是我们社会工程要研究的问题,所以,建立和发展社会治理体系,实现社会治理是需要我们从社会工程的角度去进行研究的。

我用一个图(略)来把它展示一下,社会治理的主体实际上它有三个类型,有政府类型,有市场类型,有社会类型,每一个类型都有自己的管理模式,有它自己的极致,有它面对的问题和面对的群体。我们如何把这三个类型给它变成一个系统,变成一个治理体系,这就是我们从社会工程的角度要研究的问题,这是关于社会系统工程的一系列理念、思路、方法、模型、思想,我们都可以在这个过程中进行展开。

第二个问题我想说的就是从社会工程的角度研究社会治理,实际就是要研究多元社会管理主体的管理活动之间的系统联系,这是我们要关注的主要问题。首先我们从多元主体、多种规则和多种模式的角度来看,任何一个社会管理主体的管理活动都是一项具体的社会工程活动,需要通过自己的规则体系建构来实现自己的社会管理。其次,不同的社会工程活动之间需要进行协调,每一个管理主体的自我管理,不同管理主体之间是需要进行管理行为的协调。对于多元社会主体的社会工程进行整合,就是系统的社会工程。我是这样来理解系统工程和社会治理的关系的。

在社会工程视野下我们来看社会治理建设的优先任务,我们目前的社会治理体系发育是不健全的、不完善的,所以要推动这个发育,我们本身也是社会工程展开的过程。我再举几个例子,比方说注重非营利组织和私营组织在社会治理当中的作用,比方我们设置发展高效合理的社会治理机制等等,培育共同的价值观,提高社会凝聚力,这些都是我们当前要推动解决的问题。

第三个问题我想说一下社会工程的特点。社会工程是问题导向和价值定位下的社会模式设计与实施研究,它强调问题导向,它也强调价值定位,所以价值共识的形成是社会工程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它要处理一系列的问题。这里有三类问题:第一是多方面规律、多元的价值和复杂情景因素在制度设计过程中的综合集成;第二是社会大系统结构中的不同子系统结构之间的协调互动问题;第三是关于改革演进总过程当中不同过程中的衔接和过渡

问题，这些都是我们在研究社会治理当中要关注的问题。最近有一系列的中央文件，我仔细阅读了李克强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里边有很多的思想都涉及这些内容，需要我们认真地学习和总结。

### 社会工程：顶层设计的方法论基础 ——兼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田鹏颖

(沈阳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  
钱学森社会工程哲学研究院执行院长)

我十分荣幸到人民大学参加这么高层次的研讨会，本人向这次会议提交了两篇论文，一篇是《从社会工程学到社会工程哲学》，另一篇文章就是《社会工程：顶层设计方法论基础——兼论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下面我就把关于《社会工程顶层设计的方法论基础》这篇文章的一些要点向各位老师做汇报。

第一，顶层设计：全面深化改革之需要。改革开放36年来中国科学技术哲学发展实际上奉行一个基本的研究纲领，就是没有基础就没有水平，没有特色就没有地位，没有应用就没有前途，这样一个基本的研究纲领实际上放在社会工程学和社会工程哲学里面也应该是完全适用。就社会工程研究来说，如果不研究应用问题，不给党委和政府提供政策咨询，那它的发展前景就要受到质疑。改革开放起于1978年，36年来实际上是一直在设计下面推进，在总体设计下面前行，它的总设计师就是邓小平。2014年开启全面深化改革元年，应该说比前36年的改革大概更复杂，任务更艰巨，要涉险滩，啃硬骨头。习总书记几次强调这次改革既涉及政治体制，又涉及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等，所以他说各个方面的相互配合、相互协调才能平衡，才能可持续。因此他倡导必须坚持正确的方法论，需要加强顶层设计和整体谋划，加强各项改革的关系性、系统性和可行性研究。这样我觉得社会工程方法论的研究应该说正逢其时，所以要大力倡导社会工程方法论研究。

第二，顶层设计：社会系统工程之真谛。这就要回答为什么社会工程能够成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方法论基础？涉及设计和工程的关系，没有设计就没有工程，一个好的设计才有好的工程，一个平庸的设计预示着一个平庸的工程，错误的设计决定了一

个失败的工程，科学合理的顶层设计往往能够实现工程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的统一。顶层设计2011年正式进入我们党的文件，从中央领导到学者都反复强调要研究和加强顶层设计。顶层设计实际就是现阶段中国解决错综复杂矛盾重要思维方式、理想和路径，这是顶层设计日常生活的一个内涵。从哲学视角观之，“顶层设计”是一个重要的认识论范畴。毛泽东曾经在《实践论》和《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中明确指出“实践——认识——实践”、“群众——领导——群众”、“个别——一般——个别”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那么，所谓“顶层设计”则是人类认识过程中“认识”、“领导”和“一般”阶段的思维方式和核心成果。在人们认识（识知、解释、评价、筹措）活动中，“顶层设计”关注存在与时间、工具与目的、过程与结果、设计与建构，是经济因素、政治因素、社会因素、伦理因素等的集成，而不那么注重现象和本质、必然和偶然、原因和结果。所以它一度成为社会工程的方法论基础。

第三，顶层设计：“摸着石头过河”的升华。习总书记反复强调要处理好五大关系，其中有一个就是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的关系。顶层设计不是胡乱设计，不是随意设计，它是在摸着石头过河36年实践基础上的一种提升。为什么顶层设计能变成现实？我这里讲了几个理由：一是自然科学技术增强了人们对现代社会矛盾的认知能力，二是现代社会科学方法提高了人们对现代社会矛盾的自觉，三是人类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积累了应对社会风险的丰富经验，顶层设计才能成为社会工程一个核心的范畴。

第四，顶层设计：可能转化为现实的路径。顶层设计怎么样能够从理想状态变成一个现实的？我这里讲了四个理由：一是顶层设计不是一个形容和比喻，更不是一种空泛的政治理想概念，而是精神向物质、应然向实然的转化，是顶层设计与时代问题的哲学把握，顶层设计不是对某一个个人行为的设计，而是对重大时代问题的一种哲学关注。马克思讲问题是时代的声音，当前冲破思想观念的束缚，突破利益固化，协调整体系统推进改革，这本身就是顶层设计，是重大问题的设计。二是顶层设计与人民群众的主体创造，任何一个顶层设计都不能抛弃摸着石头过河，都不能抛弃自下而上人民群

众的主体创造,特别是现在社会利益多元、诉求多样条件下,更需要维护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倾听广大人民群众的意见,科学、民主、合理地构建现代国家治理体系,所以基层的实践经验的积累与创造,将是实现顶层设计的基本前提条件。三是顶层设计与社会规律的理论制度,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和《自然辩证法》里面多次讲,人离开狭义的东西越远,那他活动就越有计划性和规划性,一旦人们的活动和社会规律正在趋向一致的时候,人类的历史才真正开始,所以随着社会科学的发展和普及,人们对社会运行的规律及人们活动规律的把握和认识将更加接近,所以顶层设计将逐渐地由一种想象和比喻、形容变成现实。四是顶层设计与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读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的文选,发现他在这里面讲得最多的是两句话:一是走自己的路,二是我们往前走往前走,不断总结经验,错了就改。善于总结经验,把经验上升为理论,顶层设计才有可能变成现实。

#### 举国体制、超大型项目与国家的均衡治理

任剑涛

(中国人民大学国发院社会系统工程研究中心研究员、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中国的国家治理到现在主要还是举国体制,大家都知道举国体制是革命时代的体制,集中力量办大事,这样一种体制作为比较政治经济体制来讲是革命时代的产物,国家治理的重点是在国家政治建构任务告一段落情况下,主要是在经济、社会领域里头动员国家的基本力量来进行国家治理。这样的治理,主要是动用国家的优势资源,来推进国家的现代发展。因此,国家的治理,中国作为一个转型国家,具有国家能力和资源配置方式的有效性。这样一种举国体制,我认为是发展促进所决定的,一方面是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另一方面作为发展绩效较好的国家,因此聚集相当的资源。在聚集资源的基础上,才能够经济、社会领域里头推进举国体制。如果是十分落后的国家,那就没有资源;如果是十分偏进,那也不可能有举国体制。举国体制是国家权力高度集中,如果国家权力高度分散,国家、社会、市场三元治理结构一旦做实,国家也不可能实行举国体制。

但是举国体制的资源配置方式,使得在经济社会领域里头的国家治理落到具体项目上的时候,国家资源的倾斜性配置往往和超大型项目紧密联系在一起,超大型项目对中国来讲明显区分为两种项目投入的结构状态:一种是计划经济时期,主要涉及国防、经济社会重大布局的超大型项目;另一个就是市场经济时期,因为积累了相当的社会资源和市场资源,因此有利于国家在经济社会领域里头推行超大型项目。因而,改革开放之后,超大型项目主要是在社会领域里推进,而且超大型项目推进的理由主要是振奋人心,实现国家统一治理的政治目标。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奥运会和世博会,不仅是高度集中国家资源,而且是以革命领袖这一举国体制和对超大型项目的明确肯定,明确了国家治理的具体方式,具体问题就不分析了。超大型项目的举国体制,一方面有它的正当性、合理性,就在于能够集中优势资源,以政治意志发挥国家治理的决定性作用;二是能够在短期和资源相对短缺,但同时又集聚了一定资源的前提下迅速推进国家的现代演变。但另一方面,以超大型项目为代表的举国体制,也会导致国家治理的非均衡性。非均衡性主要有三个含义:第一是政策布局的倾斜性考量,国家政策的均衡目标很难实现;第二就是资源的优势性布局,国计民生的均衡性开支和资源的均衡性配置会受到影响;第三就是有利于实现政治目标,但对经济社会目标均衡性实现会产生相对负面的作用。

在某种意义上,这种国家治理模式对于资源的自我耗竭会有长远的不良影响。因此,这样一种国家治理结构,可能会对国家权力结构发生政治性的一种倾斜,同时在央地关系上有利于中央集权,而不利于地方分权。在国家市场关系解决基础上,只能够是一种以国家带动的发展,而不可能实现国家、社会和市场共同发展。

因此,以超大型项目带动的举国体制,如何可能去推进国家均衡治理,满足五大文明的均衡性需求,使资源配置、动员市场、社会力量与国家所需要的政治意志相匹配,从而校正政治意志的单纯优先所带来的治理定势,将是我们下一步国家治理当中必须要解决的重要问题。

## 建设“有能力的有限政府”

## ——如何理解“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杨光斌

(中国人民大学国发院社会系统工程研究中心研究员、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世界上的国家越来越像美国或者越来越像西方,但是菲律宾、印度、墨西哥这些国家,体系上是可以设计的,能力是可以设计的吗?好像能力是几百年、一千年一路走来逐渐形成的。我们今天讲治理体系现代化,觉得这个体系还不错,能力怎么实现现代化?这是最关键的问题,因为能力从哪里来?这是设计不了的。

讲制度体系,制度是怎么来的?在座的科学家讲到钱老的系统论,这在80年代我们上大学的时候是最热门的几个“论”之一,其中系统论也是最热门的。在社会科学里,这种争论也一直存在。另外是卡尔·波普,他说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一样,这个过程是渐进的、有限的。大家对一个词“社会主义”最熟悉,社会主义一方面就是以社会主义强调社会的重要性、个人的重要性,但是社会主义本身就是控制社会、设计社会。谁来设计社会?谁来控制社会?谁来发展社会?毫无疑问,是国家,是党。所以,这个概念本身是一个悖论。

社会是可以设计的,如果作为一个工程的话,要渐进地设计。设计的契合度在哪儿?我现在想到一个词叫“顶层设计”。我们过去十年改革的停滞,专家们呼吁要有顶层设计,我认为中国历来都不乏顶层设计,即使是过去十年也不乏顶层设计,比如我们有红十字的改革,国务院来设计,下面的红十字一反对,国务院就退回去了,自上而下的设计都消失了。因此就是说我们不乏顶层设计,但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因为我们改革推不动了,一些学者就大呼顶层设计的重要性。刚才有的专家说,我们有学习能力,这是一定要承认的,但是学习能力到哪儿为止?我们特别羡慕科学家们,钱学森他们,通过导弹工程就可以全方位的和上中下游上千个单位进行合作,而社会科学永远达不到这一点。

以中国的例子来说,中国这60多年,从新中国成立,高度的学习苏联模式,在很多领域当中出现了问题。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从1978年以来,一方面有设计,但我发现它的主要规律还是设计之下的非预期性结果,你想要A,A没有达到,

可能B出现了,这种东西特别多。比如村民自治的问题,广西农民自发的选举,搞起村民自治,然后得到自上而下的认同。另外一个话题就是公民组织、公民社会,公民社会是设计来的吗?是怎么来的呢?在某种意义上它又是自发的,比如说经济改革带来了经济主体多元性、自主性,老百姓不一定再依靠单位过得也挺好,慢慢地自我生存,这是经济改革的结果,出现了这样一个公民组织。我对公民组织的研究是有限的,一定要有公民社会、公民组织就是自治,因为再有能力的政府管不好老百姓的吃喝拉撒睡,就是他们的自治。中国古代社会,明、晚清,很多乡村的自治只要一超过县一级就不合作,就没有公共性,但在地方有很好的公共性。所以我们不要迷信,公民社会一定就有好民主,这是两回事。这是我们说的公民组织是怎么来的。

另外就是网络参与是怎么来的?有了网络以后,老百姓的权利会得到自觉、不自觉的实现。现代社会都是间接参与,但是网络社会某种意义上是一种直接参与、直接的政治参与,而这个政治的结果又是20世纪90年代开创互联网的决策者们大概没有想到的东西。因此,我们一方面有很多习以为常的理论、习以为常的口号,但是我们再结合这个东西,不但中国政府是这样,整个欧洲其实都是这样的,就是说工业革命怎么走到现在,这两三百年很多问题的解决恰恰是引发下一个问题的根源,然后不知道怎么达到一个平衡点。就是欧洲包括今天我们认为还不错的一个状态,这在某种意义上你说它是自发秩序,在自发秩序当中我们有学习能力,有设计的可能性。这是我对中国历史或者欧洲历史的一点感想。

## 实现社会稳定的系统进路

张云飞

(中国人民大学国发院社会系统工程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我报告的题目是“实现社会稳定的系统进路”。这20年黄老师一直给我出这个命题,让我研究社会系统问题。

根据我目前从事的工作,我选了这个题目,维护社会稳定,我们要有一种系统思维,要系统推进。因为什么呢?改革、发展和稳定是影响当代中国的三大问题,但是现在出现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用稳定绑架了改革,绑架了发展。稳定是硬任务,硬任务落实过程当中就出现了一些暴力维稳、

高压维稳等等一系列的东西,就陷入维稳的怪圈,越维稳越不稳定。为什么会出现这种问题?我们没有把一些方法运用到维稳当中去,理论方法这方面的应用是不够的。

从理论上考虑,大家知道维纳《人有人的用处》这本书就是讲的控制论与社会。原国务委员宋健提出了人口控制论,为研究和解决中国的人口问题做出了重大的贡献。社会控制的理论方法对于我们搞好稳定工作有重要的帮助。

第一,社会控制论认为社会是复杂巨系统,包括五个要素也好,六个要素也好等等,各个方面是有沉积的,它是什么呢?它是一个多级递阶控制系统。讲社会稳定,不能离开社会管理和社会治理;讲社会管理和社会治理,不能离开整个社会建设;讲社会建设,不能离开经济、政治、文化等等,所以不能就事论事。

第二,社会建设问题事实上涉及社会福利的问题,这涉及群体整体的伦理和价值。是为了人们的福利维稳,还是为了政权而维稳?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价值取向。你要站在人民的立场上,站在人民的位置上维稳,那我认为恐怕就不会出现目前维稳工作当中出现的问题。社会控制论恰恰就强调了价值和事实的统一。

第三,如何实现社会稳定?它有未控制的东西,也有内部的控制。未控制无非就是钻空子这一套东西,但是恐怕最关键的东西还是内控制,我们内部的法律等等。比如中国社会当中讲的村规民约,我们过去讲的乡村治理等等,我们现在发展市场经济,恐怕就需要契约精神,需要诚信精神。

第四,对社会系统理解不能采用绝对的二分方式。事实上纯粹的绝对的冲突和纯粹的绝对的和谐都是不存在的,这二者之间有一种辩证的张力。有时候有些小的不稳定的东西,它似乎是扰乱了社会系统,但它可能给你发出一个信号,你通过负反馈控制的方式可能有助于整个系统有序地运行。但我们恰好对这个东西是注意不到的,所以有暴力维稳等等这样一套东西。这是我们要注意的。

第五,通过对社会系统的分析,我们要看到在维护社会稳定过程当中要有一种系统的思路,一种系统进路,从各个方面来推进,这也是我们国家治理体系的一个构成问题,是我们提高社会治理能力的问题。

## 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需要“总体设计”

林坚

(中国人民大学国发院社会系统工程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学报编审)

现在都讲“顶层设计”,我觉得用“总体设计”应该更好。总体设计包括顶层设计、中层设计和底层设计或者是基层设计。光讲顶层设计的话,好像说只有高高在上,先做好了,你下面的听着就行了。作为一个复杂系统,它应该是一个多层次的复杂系统,它有顶层的,也有中层的,也有底层的。这应该是总体设计,我们用总体设计的方法,应该说可以包括范围更广泛。

会议的主题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我们讲社会总布局是“五位一体”,包括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建设。现在讲治理体系也可以从这五方面来讲,包括经济治理、政治治理、文化治理、社会治理、生态治理,这五位一体应该说它是密不可分的。我们以前把有些东西分割得很细,实际上很多东西都是交融在一起,相互缠绕,它是互相构造的。

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是一项社会系统工程,要应用社会系统工程的理论和方法。国家治理体系,涉及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等各个方面。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需要进行总体设计,因为它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是相辅相成的。根据总体设计的战略部署,要系统谋划、整体推进、综合施策。现代化国家治理必须突出治理体系与机制、体制机制的创新。治理现代化必然涉及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调整。国家治理必须形成整体的社会合力。社会治理体系的主体包含着多种要素,可以说政党、政府、市场、社会、公众共同构成国家治理体系的一个结构。这也是五个方面,这五个方面是错综复杂的一个结构。

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包含科学化、法制化、制度化和规范化的内涵。国家治理体系和社会治理体系有一定的区分,但是它也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涉及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国家治理与社会治理的关系,这也是相互联系的,要进行总体分析、总体论证、总体协调、总体规划,所以我们说要强调总体设计。

(责任编辑:雷会生)